

中国营造学社测绘调查研究史述略

成 丽

(华侨大学, 福建 厦门 361021)

摘 要:中国营造学社所进行的古建筑测绘及调查活动是我国建筑史研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建筑史学和建筑文化遗产保护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通过梳理中国营造学社时期古建筑测绘调查活动的相关史料及文献,选取突出的历史事件和研究主体,对研究目的、形式和成果进行分析归纳,明晰其学术思想和研究方法,为后续研究提供参考和借鉴,以促进对中国古代建筑更为深入的研究。

关键词:古建筑测绘;史学史;研究方法;学术思想

中图分类号: TU-09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8-7192(2013)01-0060-06

A Brief Introduction of the Research History of Surveying and Mapping of Society for the Study of Chinese Architecture

CHENG Li

(Huaqiao University, Xiamen 361021, China)

Abstract: The surveying and mapping of ancient architecture and the investigation activities by Society for the Study of Chinese Architecture are the significant components in the study of Chinese architecture history, for they have laid a solid foundation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architectural historiography and the preservation of cultural heritage of architecture. The paper sorts out from relevant historical data and documents the highlighted events and subjects, and induces analytically the objectives, the methods and outcomes of previous researches, for the purpose of providing a reference for the follow-up study and deepening the research of Chinese ancient architecture.

Key words: surveying and mapping of ancient architectures; the history of historiography; research methods; academic thoughts

一、构建研究平台

1. 中国营造学社的创立

1925 年,朱启钤先生以私人名义成立了以研究中国古代营造学为目标的私人学术团体——

“营造学会”,专门从事相关文献的整理研究工作^[1]。此后,在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的资助下,朱先生将“营造学会”更名为“中国营造学社”(以下除引文外,均简称“学社”),於 1930 年初开始工作^[2],由此拉开了中国建筑史学以及文化遗产保护事业的大幕。

收稿日期:2012-02-04

基金项目:福建省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2011J01315)

作者简介:成 丽(1977-),女,河北张家口人,华侨大学建筑学院讲师,主要从事建筑历史理论及文物保护研究。

朱先生在对营造学和全部文化史关联性的宏观体认下,为学社制定了周密的研究计划,其中最主要的思路就是以文献研究为基础,进而开展实物调查^①。因此,在学社构建时,他十分明确地表达了实物测绘研究的思路,并安排了专职人员,《中国营造学社汇刊》(以下除引文外,均简称“《汇刊》”)第1卷第1册《社事纪要》所列常务名单即有“编纂兼测绘工程师刘南策、测绘助理员宋麟征”等人。

2. 从文献到实物研究的技术路线

学社成立后,朱启铃先生首先确立了由清代到古代、由清工部《工程做法》到宋《营造法式》、由文献到实物的技术路线:即以匠为师、参照实物和文献释读清代建筑,进而以充足的文献研究为基础展开实物调查,上溯至《营造法式》及宋、唐建筑,直至探及整个中国营造学体系和文化背景。

朱先生最初聚集了一批以历史学、文献学为主的学者,首先开展文献研究。1932年3月,提出之后将以实物研究为主的工作计划,并明确指出实物研究的开展正是初期文献研究“自然之结果”。他还充满信心的预言:“而此种研究法,在本社为工作方针之重新认定,而其成绩则将为我国学术界空前之贡献”^[3]。

3. 引进建筑专才

学社成立时,其成员主要由两部分组成,一为专职从事研究工作的职员;一为财界、政界、社会名流、学术文化界、建筑界人士以及营造厂商等古建筑专家和外籍学者组成的社员^[4]。在学术研究渐次展开的同时,朱启铃先生在学社成员的构成方面也煞费苦心,一直关注并积极网罗建筑专业人才,如梁思成、林徽因二位学者在学社成立之初,即以参校的身份出现在1930年7月《汇刊》第1卷第1册《社事纪要》学社成员名单上;刘敦桢先生则以校理

的身份,出现在1930年12月《汇刊》第1卷第2册的学社成员名单上。这些信息进一步明确了朱先生研究中国营造学的专业取向,他在积极网罗优秀建筑专才的同时,也为致力于中国营造学研究的有志之士提供了一个难得的契机。

二、梁思成、刘敦桢入社主持工作

1. 日本学界的刺激

1930年6月,日本学者伊东忠太应邀在学社演讲,指出对中国建筑的研究应当有充分的文献和实物调查,同时又特别表达了由日方负责实物调查、中方负责文献考证的意图^[5]。1931年5月,另一位日本建筑史学家关野贞到北京与朱启铃先生商讨合作事宜,更明确表示只有日方才有能力和经验对中国古建筑进行实物测绘和研究^{[6]2-3}。

日本学者的狂妄自诩深深刺激了朱先生,他感到只有尽快引入建筑学专才和现代科学研究方法,才是未来发展的方向,才能把中国古代建筑研究纳入明确的科学体系中。同时为了争夺中国人研究中国建筑的话语权,在相关文献研究尚未达到预想阶段之时,朱先生决心加快引进建筑学专才的步伐,迅速展开实物调查及测绘研究^②。

2. 力邀梁思成、刘敦桢入职

曾受过国外现代建筑学教育并具有深厚国学根基的梁思成、刘敦桢二位先生,在正式入职学社之前都已开始了对古建筑的研究,并有相关成果见诸于世,引起朱启铃先生的高度重视^③。1931年6月,梁先生在学社力邀下离开东北大学成为专职社员;7月,学社改组并聘其为法式部主任,表明了开展实物研究的决心。是年夏天,学社又与时任中央大学教授的刘先生拟定了赴大

①对于实物调查,朱启铃先生早在学社成立之前就策划并亲力实施,略如1929年11月为学社成立资金资助之事致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董事会函中所述:“然个人旅行中之踏查辽金遗物及同志分担之采集资料,于事实上、精神上之进行,固未尝或辍”。引自社事纪要[M]//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1卷第1册),1930。

②1934年,朱先生在设法化解学社经费困难,上书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董事会的时候,仍对日本学者的觊觎之心耿耿于怀,并由此强调中国人自主研究营造史的决心:“窃念敝社为我国学术界研究中国建筑唯一之机关,数年来对于中国建筑界亦有相当之贡献,而欧美考古专家引为同调者,发疑问难,及探索材料、交换刊物,莫不认本社为标的。假使一旦停闭,则非但使国内青年研究斯学者感觉参考材料之断绝,而且使国际上自诩包办东方文化者所快意,此敝社同人所惴惴不甘者也。”引自本社纪事[M]//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5卷第2期),1934:128。

③1929年,梁思成先生曾与同在东北大学任教的妻子林徽因先生测绘沈阳北陵。参见曹汛、林徽音先生年谱[M]//王贵祥.中国建筑史论汇刊(第壹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9:351。

同等处实地考察的计划,因时局未能成行,后由学社派出技师刘南策,带领中大建筑系学生实测北平智化寺,初涉宋、清过渡实例的明代建筑^[7]。与此同时,朱先生也迅速安排已经入社的梁先生着手实物测绘,计划当年11月开展平东辽代建筑调查,后碍于时局延后至次年春进行^①。1932年3月,学社特地聘请刘敦桢先生兼任文献部主任。7月,刘先生辞去中大教职,前往学社专门从事中国古代建筑研究^[3,8]。

朱启钤先生作为学社的领导者,在赏识梁、刘两位年轻学者才学的同时更委以重任^②,为二人后来的研究提供了极为可贵的条件,梁、刘亦不负朱先生厚望,以高度的敬业精神与卓杰才华,使中国建筑史学的研究得以大大向前推进。

三、“前理解”性的清代官式建筑研究

如前所述,梁思成先生入社主持法式部工作后,由于时局动荡未遑展开实物测绘,在朱启钤先生的指导下,转而投入研究清代建筑。按朱先生的规划,对清代建筑的研究主要也是为了上溯至明、元、宋、唐,解读《营造法式》,为构建对中国建筑史框架做准备^[9]。

1. 以匠为师,沟通儒匠

长期从事工程事务的经历,使朱先生对中国古代营造学和“匠作传统”有着深刻的体认和发自内心的尊重。比照中、西方营造传统,他深感我国传统工程做法在世界建筑史中独具特色,并

意识到古代相关文献与工匠相结合对研究中国古代营造学的重要性^[10]。加之当时西学东渐之风日炽,朱先生深惧“西学”冲击中国传统营造学,致使失传,遂即寻访营造匠师,搜集匠师口耳相传的珍贵经验与工程籍本,以求保存中国营造传统^[11]。

朱先生还注意到宋《营造法式》编者李诫通过梳理历史文献并以“稽参众智”、“勒人匠逐一讲说”的方式编修该书,在整理匠作技术的同时,建立了堪称科学的营造体系。受此启发,他为学社确立了“沟通儒匠,浚发智巧”的使命,以访问清末大木匠师作为认识古代建筑的途径之一,同时记录传统技术和工艺;并聘请老匠师绘制大木结构详图、彩画图样,还设想尽可能利用摄影、留声机等记录匠师行为,保存匠作工艺传统^[12]。

2. 对清代建筑文本的研究

梁思成先生入社后,在朱先生已有大量研究的基础上^③,首先从学习、整理清工部《工程做法》和匠人抄本、《营造算例》入手,由工匠指导,参证北京明、清建筑,利用现代建筑投影方法绘制构造图,释读清代营造术语,在短时间内迅速取得大量成果^④。研究中除了对清式营造法的解释外,还多有与宋《营造法式》的比对。也正是通过这种比对,梁先生发现宋、清建筑存在很大差别,并逐渐明确了调查、测绘明清以前建筑实例的紧迫性^[13]。

与此同时,相关清代建筑研究成果还有刘敦桢先生负责整理的《牌楼算例》^[14],王璞子(王璧文)先生编纂的《清官式石桥作法》^[15],等等。梁先生入社前就早已开展的清工部《工程做法补图》工

①1931年11月8日、26日,日本侵略者两次策划指挥了天津“便衣队暴乱”,均被东北军组成的天津保安队击溃。按梁先生在《蓟县独乐寺观音阁山门考》中所记:“廿年秋,遂有赴蓟计划。行装甫竣,津变爆发,遂作罢。至廿一年四月,始克成行”;以及1932年3月《汇刊》第3卷第1期《本社纪事》记“于预定出发前两日,天津便衣队暴动”推算,梁先生计划出行的日期当在1931年11月10日。

②如1932年3月朱先生在《汇刊》第3卷第2期《本社纪事》中所述:“梁君到社八月成绩昭然,所编各书,正在印行。刘君亦常通函报告其所得,并撰文刊布。两君皆青年建筑师,历主讲席,嗜古知新,各有根底。就鄙人闻见所及,精心研究中国营造,足任吾社衣钵之传者。南北得此二人,此可欣然报告于诸君者也。”

③1934年1月,梁先生在《清式营造则例·序》中特别指出:“我在这里要向中国营造学社社长朱桂辛先生表示我诚恳的谢意,若没有先生给我研究的机会和便利,并将他多年收集的许多材料供我采用,这书的完成即使幸能实现,恐怕也要推延到许多年月以后”。引自梁思成. 清式营造则例·序[M]. 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1:2.

④《营造算例》经梁先生整理后,于1931年陆续发表在《汇刊》第2卷第1、2、3册上。1932年3月基本完成《清式营造则例》的图释工作。继后,梁先生又将清工部《工程做法》、实例、匠师口述经验和之前整理的《营造算例》综括为《清式营造则例》一书,于1934年正式出版。具体情况参见《汇刊》第3卷第1期(1932年3月)、第4卷第3、4期合刊本(1933年12月)、第5卷第2期(1934年12月)、第5卷第3期(1935年3月)中的《本社纪事》。

作,也改由法式组进行修改、更新和扩展^{[16]①}。

这一系列的学术研究成果,展示了清代建筑工程古籍术书等方面的研究作为中国建筑史学基础的重大价值和意义,为后来大量展开的实物测绘提供了必要的“前理解”。由朱启钤先生指导下的相关研究,形成了一种以工匠传统结合文献和实物共同解读古建筑的研究方法。按照中国传统营造学社的特点,采用这种研究路线和方法,在当时既是必然的选择,到现在也仍是一种行之有效的途径。

四、大规模测绘及调查

在上述各方面因素的准备和促进下,学社具备了实地考察的条件,确立了以调查、测绘明清以前的建筑实例为主要目标,研究工作从单纯文献研究开始转向与实物测绘相结合的模式,实现了从“闻”到“见”、从“间接”到“直接”的转变。

1. 独乐寺测绘——研究方法初步确立

1932年4月,梁思成先生带领学社成员赴蓟县测绘独乐寺观音阁及山门,运用现代研究手段,获得很多单靠文本解读无法获得的认识。梁先生在随后写就的《蓟县独乐寺观音阁山门考》^[17],归纳了这次研究的经历、方法与成果。该文集科学的研究方法、精确的测绘图和严密的考证于一身,深度分析了两座当时所知年代最早的中国建筑。郭黛姮先生认为这次的活动充分证明了“中国学者的研究实力,使中国人增强了民族自信心,也削弱了日本人的气焰”^{[6]24}。

梁先生在独乐寺的研究过程中,表现出在之前清代建筑研究“前理解”的基础上,实物与文献相结合的极大优势。但是,由于此前对《营造法

式》的解读有限,理解未深,此次测绘研究也存在一定的问题,例如“角柱生起”这个重要特征就曾被忽略^②。此事也让梁先生一直耿耿不能释怀,后来他在1933年调查正定隆兴寺就特别注意了这个问题^[18],自此,“角柱生起”在早期建筑的研究中开始受到重视。这个事例也切实证明了深刻的文本解读对实物研究的重要指导作用,而古建筑测绘也并非是一蹴而就的事情,难免错漏遗憾,更需要不断的反复研究才能获得真知。

2. 密集高效的测绘调查——研究方法渐趋成熟

在完成独乐寺测绘后不久,同年6月,学社成员又测绘了建筑年代稍晚于独乐寺观音阁及山门的另一座辽构——河北宝坻广济寺三大士殿,强化了对辽代建筑形制的认识;1933年4月,对河北正定展开考察,首次涉及北宋木构;1933年9月,前往山西大同调查测绘华严寺及善化寺古建筑,对宋、辽、金建筑形成系统化认识^③。此后,学社逐渐明确了测绘调查、年代判断、分析总结和行文体例等方面的研究理路,形成了科学系统的工作程序,也成为其后中国建筑史学研究的“标准范式”。

自大同古建筑调查研究后至1937年6月,学社在梁思成和刘敦桢二位先生的带领下,开展了大规模的实物调查测绘,涉及山西、山东、河北、河南、陕西、浙江、江苏等省^④。在几年间密集高效的实物调查与测绘研究的过程中,不仅积累了大量的实物资料,更使学社成员对各时期的建筑有了深刻的理解,对古代建筑文献特别是生涩难懂的宋《营造法式》也有了鲜活的体认。但是,至此发现最早的木结构实例仍是初期调查的独乐

①这项工作因1932年以后的大规模测绘而暂置,直至1950年代,王璞子继承学社的研究目标,开始对清工部《工程做法》进行注释,由王金榜和张中义绘制补充插图,1980年完成全部注释工作,1995年《工程作法注释》正式出版。参见王璞子.工程作法注释[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5。

②刘敦桢先生后来回忆道:“在对河北蓟县独乐寺观音阁的初测中,就未绘出生起,经朱启钤老先生根据《法式》提出,后来我和莫宗江等五人再去测绘才予以修正。”引自刘敦桢.中国木结构建筑造型略述[M]//刘敦桢全集(第6卷).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7:227。

③具体事项参见:文献[3];梁思成.宝坻县广济寺三大士殿[M]//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3卷第4期).1932;本社纪事[M]//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3卷第4期).1932;本社纪事[M]//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4卷第2期).1933;文献[18].1933;梁思成,刘敦桢.大同古建筑调查报告[M]//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4卷第3、4期).1933。

④具体事项参见:文献[16].1935;本社纪事[M]//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5卷第4期).1935;本社纪事[M]//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6卷第2期).1935;本社纪事[M]//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6卷第3期).1936;本社纪事[M]//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6卷第4期).1937;文献[4]第86-88页。

寺观音阁和山门,而学社成员一直坚信国内肯定存有唐代建筑。

3. 佛光寺东大殿——“中国最古的木构”

1937年6月,梁思成、林徽因、莫宗江、纪玉堂等学社成员第四次入山西,到五台山展开调查,最终找到了日本学者目睹、拍照、出版却仍不能确认的唐代建筑佛光寺东大殿^①,终于给关野贞曾经妄下“中国和朝鲜一千岁的木料建造物,一个亦没有”^[19]的结论以有力回击^②。梁先生在惊喜之中,也发出了“国内殿宇尚有唐构之信念,一旦于此得一实证”的感叹^[20]。

这次对佛光寺东大殿建筑年代的考证,主要依靠形制和文献两个方面的证据(包括建筑形制、寺内经幢、相关记载、敦煌壁画、椽底题字及宛具唐风的书法样式等几个方面),表现出十分娴熟的文献考证和年代鉴定的功力,典型如梁思成、林徽因二先生凭藉一个供养人的雕像,通过查阅其背景材料,对东大殿建造年代的精彩推断。1940年,梁先生在《华北古建调查报告》中生动的讲述了这次对东大殿年代鉴定的细节^[21]。

佛光寺唐代建筑的发现和研究,成为这个时期学社实物调查测绘终结性的辉煌成果,这不仅是当时发现的中国境内最早木构,其更大的价值还在于为后来李庄期间构建中国建筑史基本框架提供了确凿的实物证据。

4. 昆明、李庄时期的工作——回溯与总结

在佛光寺研究之后,抗日战争爆发,学社研究的主力梁思成、刘敦桢、刘致平、陈明达、莫宗江等学者随西南联大离开北平前往西南后方,社

址定在云南昆明市郊外的麦地村兴国庵。朱启铃先生留守北京,委托梁思成、刘敦桢继续领导学社的研究工作,开展对西南地区的实地调查研究^[22]⁷²。

自1938年10月至1940年2月,学社成员先后到云南、四川、陕西、西康等地调查测绘^③。发现了众多不同时代的遗存,如汉阙、崖墓等以及建国后被列为国宝的一系列早期建筑,此外还调查了大量民居。这些工作弥补了先前单一地区研究的局限性,也填补了中国建筑史学研究中的空白。

1940年,学社又因时局辗转至四川宜宾的李庄镇。在梁思成、刘敦桢等学者的艰苦努力下,调查研究及服务方面,仍极力不使中辍^[23]。学社成员罗哲文先生回忆当时在经费极度紧张的情况下,实物研究仍是重要工作之一^[24]。后来,在实物研究日渐困难的情况下,结合在西南地区的新发现,学社开始系统整理以往的成果,展开理论研究并予以提高升华,如注释《营造法式》、撰写《中国建筑史》等。1944年10月及1945年10月还出版了著名的《汇刊》第7卷第1、2期,刊出此前实物调查研究的成果。学社末期还编写了《战区文物保存委员会文物目录》、《全国重要建筑文物简目》,不仅成为特殊时局中的学术研究成果,也是建国后全国范围内大规模文物普查和古建筑修缮保护的先声。

1946年,在客观条件极度匮乏的情况下,大规模的古建筑调查测绘及研究工作即告停滞,机构建置也日渐式微。限于当时的政治、经济等外因以及学社成员离散和研究发展趋势等内因,学

①关野贞、常盘大定撰12卷本《支那文化史迹》,其中收入五台山佛光寺大殿照片,却不能知其为唐代建筑。参见文献[6]第3页。

②事实上,伯希和在1931年为《敦煌图录》所写的书评中提到有敦煌宋代窟檐,已经推翻了日本学者常盘大定和关野贞所认定的中国木建筑没有比1038年(指大同华严寺薄伽教藏殿)更古的建筑。梁思成先生则在《伯希和先生关于敦煌建筑的一封信》中继续探讨了敦煌宋代窟檐“唐式”形制的问题。参见梁思成、伯希和先生关于敦煌建筑的一封信[M]//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3卷第4期),1932:124。

③详细工作及成果主要有:1938年10月~1939年1月,对昆明及其近郊10市、县的调查,筛选出古建筑、石刻及其他文物共68项,由刘敦桢先生负责编写调查报告,梁思成先生根据调查资料编写《调查录》。《调查录》中的部分内容,后来由刘先生以论文形式发表,有《云南之塔幢》(见《汇刊》第7卷第2期,1945年10月)、《云南古建筑调查记》、《西南古建筑调查概况》(部分)、《丽江县志稿》(见《刘敦桢文集》第3卷,1987年)。此外还有刘致平先生撰写的《云南一颗印》(见《汇刊》第7卷第1期,1944年10月)。梁先生撰写的《调查录》后来冠名以《西南建筑图说(二)——云南部分》收入《梁思成全集》第3卷。1939年9月~1940年2月,调查四川和当时西康省的31个市、县,从中筛选出重要古建筑、石刻及其他文物107项,由梁思成先生整理成《西南建筑图说》,该成果限于当时条件未能出版,其中一些内容,后来由学社部分成员以论文形式发表,计有:莫宗江《宜宾旧州坝白塔宋墓》、卢绳《旋螺殿》(见《汇刊》第7卷第1期,1944年10月)、刘致平《成都清真寺》(见《汇刊》第7卷第2期,1945年10月)、刘敦桢《川、康古建筑调查日记》、《西南古建筑调查概况》(部分)、《川康之汉阙》、《四川宜宾旧州坝白塔》(见《刘敦桢文集》第3卷,1987年)、陈明达《汉代的石阙》(见《文物》1961年第12期)。2001年《西南建筑图说(一)——四川部分》收入《梁思成全集》第3卷。

社最终解散,后来一直没有得到恢复^{[22]84-87}。

五、结 语

自1932年国人首次以现代测绘调查等研究方法对独乐寺辽代建筑展开研究以来,至今已有八十年的历史。在这个过程中,朱启铃先生首先从对中国营造学的整体观照着眼,成立学社为专门学术研究机构,并竭力网罗专业人才,引入现代科学方法,将文献与实物研究密切结合,对中国古代建筑展开大规模的调查测绘,也由此发现并记录了大量重要的古代建筑遗构,揭示其演变规律及成就,确立了古代建筑研究的科学体系,创立了中国建筑史学及其治学方法,同时完成了文物保护观念和思想体系的建构,为中国建筑史学和建筑文化遗产保护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建国后,以国家文物单位和高等院校古建

筑测绘教学为主的研究力量,在继承学社研究方法和学术思想的基础上,将其开创的古建筑实物调查及测绘事业不断向前推进,无论范围、类型、数量和深度,都超过了学社时期。

八十年来的对古建筑实物测绘的不辍研究,使学者们对中国古代建筑的体认不断深入,研究过程中所呈现的种种误区和弊端,也逐步得到修正。但必须指出的是,每个阶段的研究成果都是时代的积累和学者个人学力的反映,并不是所有的成果与方法都处在当今学术前沿,有些是前一时期的前沿性研究,在当时为学术界提供了新的知识与方法,同时也构成了现在的认知基础。因此,古建筑调查及测绘研究需要不断的对研究方法和学术思想进行回溯和反思,对既有研究成果进行补充和重新挖掘,使研究活动及成果的非终结性成为基本共识,才能在更为客观的基础上促进中国建筑史学的发展。

参 考 文 献

- [1]朱启铃.朱启铃自撰年谱[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6.
- [2]朱启铃.中国营造学社开会演词[M]//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1卷第1册.北京:中国营造学社,1930:10.
- [3]本社纪事[M]//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3卷第2期.北京:中国营造学社,1932:162-163.
- [4]林洙.叩开鲁班的大门——中国营造学社史略[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5:19-20.
- [5]日本伊东忠太博士讲演支那建筑之研究[M]//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1卷第2册.北京:中国营造学社,1930:9.
- [6]杨永生,王莉慧,编.建筑史解码人[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6.
- [7]本社纪事[M]//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3卷第1期.北京:中国营造学社,1932:187.
- [8]刘敦桢先生生平纪事年表[M]//刘敦桢全集:第10卷.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7:212.
- [9]朱启铃.中国营造学社概况[M]//吴廷燮.北京市志稿(六)·文教志(下).北京:燕山出版社,1990:186-190.
- [10]朱启铃.石印《营造法式》前序[M]//[宋]李诫.营造法式(下).北京:中国书店,2006:1112-1113.
- [11]本社纪事[M]//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2卷第3册.北京:中国营造学社,1931:18.
- [12]朱启铃.中国营造学社缘起[M]//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1卷第1册.北京:中国营造学社,1930:3.
- [13]陈明达.中国建筑史学史(提纲)[M]//贾珺.建筑史论文集:第24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9:149.
- [14]刘敦桢.牌楼算例[M]//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4卷第1期.北京:中国营造学社,1933:39-81.
- [15]王璧文.清官式石桥作法[M]//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5卷第4期.北京:中国营造学社,1935:56-136.
- [16]本社纪事[M]//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5卷第3期.北京:中国营造学社,1935:156.
- [17]梁思成.蓟县独乐寺观音阁山门考[M]//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3卷第2期.北京:中国营造学社,1932:1-92.
- [18]梁思成.正定调查纪略[M]//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4卷第2期.北京:中国营造学社,1933:18.
- [19]关野贞.日本古代建筑物之保存[M].吴鲁强,译//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3卷第2期.北京:中国营造学社,1932:103.
- [20]梁思成.记五台山佛光寺建筑[M]//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7卷第1期.北京:中国营造学社,1944:14.
- [21]梁思成.华北古建调查报告[M]//梁思成全集:第3卷.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1:357-358.
- [22]崔勇.中国营造学社研究[M].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04.
- [23]复刊词[M]//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7卷第1期.北京:中国营造学社,1944:3.
- [24]罗哲文.忆中国营造学社在李庄[J].古建园林技术,1993(3):10-11.